

名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



毕淑敏：我写故我在
徐滔：光环背后的真实女人
元元：从『刀子嘴』到『豆腐心』
夏雨：美好生活很简单
袁泉：你看蓝蓝的天
赵琳：人生的另一种可能
陈伟鸿：对话之间天地宽

情感档案



王莉／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情感档案



王莉/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感档案:名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/王莉著.

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5.5

ISBN 7-80128-625-1

I. 情…

II. 王…

III. 名人-访问记-中国

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4358 号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100101

电 话:64924716(发行部) 64928661(编辑部)

网 址:www.zgyschs.cn

E-mail: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×1092 毫米 1/16 14 印张

字 数 245 千字

定 价 26.0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情感档案



毕淑敏

1

我写故我在



夏雨

23

美好生活很简单



袁泉

39

你看蓝蓝的天



陈伟鸿

53

对话之间天地宽



徐滔

103

光环背后的真实女人



元元

139

从“刀子嘴”到“豆腐心”



赵琳

183

人生的另一种可能

梦中的夕阳(代后记)

220



毕淑敏

我写故我在

毕淑敏: 我写故我在

人物小传

毕淑敏,女,1952年出生于新疆,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。1969年入伍,在喜马拉雅山、冈底斯山、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。1980年转业回北京。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,开始专业写作,共发表作品200万字。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陈伯吹文学大奖、北京文学奖、昆仑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青年文学奖、中国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、中国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。

心理学博士,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工作。

对一个女性来说,我会特别看重自己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的稳定,我想这有点像红军有没有根据地,我觉得有根据地和没有根据地太不同了。

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彼此能不能互相尊重,是在于互相人格上的那份平等。位置并不是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,我认为因素在于双方的某一个平衡,即心理、人格是平等的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世俗就是很厉害,如果你有魄力、有思想,那就对了,就是这时候才显出你的能力来了,你的思想在哪里,你很坚信人就是生而平等,并不是男尊女卑,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爱情,并不是谁的职务高他就更优秀。假如对这些观念很坚定的话,她就可以对抗世俗,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这些很清晰的概念,她清楚就没有什么。

——毕淑敏

采访时间:2000年11月26日14:30至16:30

采访地点:中国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二层多功能厅、休息厅

受访人：毕淑敏

采访人：王莉

采访思绪

毕淑敏，这位仰慕已久的女作家，此刻正端庄地坐在对面，接受我的采访。她看上去十分郑重而平和，没有丝毫敷衍的表情，坐下时她还下意识地理了理衣襟。她是被我刚刚从全国妇联第八届第三次执委会的会场中“找”出来的。

她笑容可掬地推开会厅的门出来时，手里还攥着我请服务生带给她的字条。直到采访结束她又把纸条拿进会场，这件小事体现出她对人的尊重。

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熟悉的发式，清洁的发丝随着她讲话的动作在午后的阳光中袅袅飘动，给我一种清新怡人的感觉。

她声音清脆悦耳，语调亲切动人，态度热情诚恳，思维活跃缜密，她的语速很快，语言表达流畅。

整个采访过程充满了她爽朗的笑声，她的笑声极富感染力，一下子消除了拘谨，拉近了距离，为谈话制造出一份轻松。她常常会随着笑变换一种坐姿，特爽地向一方用力摆动一下身体或头发，使人忘却她的年龄，感到她的可爱和心态的年轻。我猜测在生活中她是一个热情开朗、身心活泼的人。

这是一次愉快的交流。谈话中我们常常会心一笑，让我强烈感受到与之分享的快乐。当重听采访录音时，我还会为整个酣畅的对话所吸引，兴趣盎然，忍俊不禁。她是一个令人愿意与之分享的有魅力的人，你会情不自禁地说出内心的感受，她的迅速理解与情感上的呼应又强化了你的这种愿望。静静地倾听她讲话，会下意识地想起一首歌的名字：《在你面前好想流泪》。

当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时，我们已迅速跨越了年龄、职业、阅历的鸿沟，达到了一种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。分别时我们已然像认识很久的朋友。

采访实录

关于影视文化

王莉：记得1998年11月我在广院听过您的文学讲座，当时您的到来成为校园文化报道的一个热点，时隔两年还记忆犹新。我最早读您的作品是一些清新隽永的散文，如《素面朝夭》，情文并茂的笔法给我印象很深。作为一位著作颇丰的女性作家，

请您从个人角度谈谈对中国影视节目的看法,好吗?

毕淑敏:我前两天到湘西土家族自治州,在那个偏僻的山里走时,可以看到很破旧的房子,跟沈从文先生在本世纪初描写的情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,但也可以看到电视卫星接收天线(笑)。科技确实带来了巨变,住在那种很古老的瓦房、木房、木板房里的人,也可以知道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和大城市里正在流行的话题。科技的进步,传媒业的发展给我们的精神、生活、文化、价值观念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。

电视正以一种空前的规模进入千家万户,而电视的发展又掺杂了很多因素,它是一门年轻的艺术,同时又受到非常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,几乎是“捆绑”在一起出现的東西。越是好的节目就一定会看到越多的广告,因为好节目成本也高,并且为大家喜闻乐见,而它的播出不是无偿的,是有代价的,代价就是有许多商业行为伴

随在里面。

王莉:广告多而杂,这是大家都很反感的,那如何在观众满意和商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呢?现在这个好像比较难。

毕淑敏:这个问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,比如我们想看到好的节目,就要有好的剧本、好的演员、好的拍摄水准,不可能是无偿地来做。如果无偿来做,一个可以,短期可以,不可能是长期的,那么谁来出这笔费用呢?这样一种传播方式和科技、商业、运作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受经济规律的制约。男女老少都会看电视,而且又很随意,看的人可以时刻走动,观众从5岁一直到80岁,我觉得难度很大,就像食品、药品、衣服,甚至室内的温度,成年人与小孩子要求都不一样,因为现在人的需求特多元化了,家里一台电视机有几个人就有几种意见,多少台电视都不够,那也是一个经济问题,还牵涉到住房够不够大,能否摆得下这么多电视,所以,这个矛盾我想会长期存在。



王莉：您是因小说《红处方》被改编成电视剧而介入影视圈的，您一直从事小说、散文创作，您如何看待影视创作？

毕淑敏：原则上说，迄今为止我没有写过电影、电视剧本，《红处方》是别人改编的。它们虽有联系，但毕竟是两个艺术门类，作为一个小说、散文作家，我的材料是一种文学语言，是一种很古老、很单纯的东西。当我说“美丽”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可能有美丽的概念，读者看到“美丽”时是从个人的经历里面去展开与“美丽”这个词语的联系，读者会有一种生发和想像。但是电视不同，它有一个画面，一个声音，电视是一种视听艺术。我认为电视和语言各有利弊，在写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时，电视一定是有它的优越性，但是在表达思想和抽象的词汇时，语言更有优势。比如说我在文章中写到“祖国”，大家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但在电视里说到“祖国”，那就很复杂了，画面中会出现天安门、雪山、草地、五星红旗、士兵、黄河、长城以及盛唐、多民族、印刷术直至今天的航天飞机……你就想吧，有很复杂的东西，也不能穷尽。

抽象的、思想的东西，我想语言会更占优势。我个人认为，起码到目前为止，最早的人是画图的，然后是在最原始的东西之上才提炼出一种文字。而现在是一种并行，古代的岩画刻在石头上，如表现狩猎，画得很粗糙。现在通过音乐、图像、高科技的制作手段，表现狩猎这一场景时，可以非常丰富。它们是并驾齐驱地发展，互相依存。

王莉：平常您看电视多吗？如果看，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节目？

毕淑敏：我看电视比较多。因为看一个好的电视节目不能说是浪费时间，比如看南极风光，我们不可能去过南极：一个非常高超的摄影家蹲守了几年才拍到的某种动物的生活情况，都是非常宝贵的知识。但电视节目有一种不可知性在里面，你不知道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会在什么时候出现。比如我有时和朋友说某一节目可看，如《科学探索》挺有意思的，会一起交流。但是对于观看电视节目有指导性的、有权威性的、有参考价值的资讯太少了。他们会说那个节目好看，但通常我会觉得他们是被雇佣来的，电视报上也会有导视，但它只是把剧情给你交代一半，然后说：想知道最后结局如何，那你就到几点几分收看。

王莉：吊着你的胃口，也许看完了挺失望的。

毕淑敏：对。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方法，还是初级阶段，有时可能还会有商业目的的驱使。我希望能有更高、更好的方式：有哪一个层次的人对哪一个栏目感兴趣，那个节目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，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、自发的、口口相传的方式，比如说那个节目好看，或过一段时间又说那个节目不行了，现在又堕落了，不能看了，没什么可看的，电视节目就不可知。

如果电视节目能像书那样，第一，书评家可以给读者一些介绍和意见；第二，在书店买书时，你既可以看前边，也可以看后边，用多大力量去看，你可以有一个选

择。而看电视时你必须几个小时坐在那里,你总是期待它会有一些更新、更好的内容,但最后变得非常疲惫以后,你会发现今天晚上什么都没看,时间就过去了,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!生命对我来讲特别宝贵,组成我生命的就是时间,我拿出这段时间是必须让它有一个回报,说得更确切一点,我等在电视机前的成本太高了。

如果有什么好节目,能准时播出,又特别有意思,那让我看一眼广告也没什么,人要付点代价,这个逻辑关系我可以想清楚。

王莉:您刚才提到与朋友交流一些可看的电视节目,能举个例子吗?

毕淑敏:(略一沉思)……

王莉:比较少,而且是变化的,可能是某一段时间好看,过一段时间又不可看了。

毕淑敏:对。现在报纸上没有编好的导视,哪些节目有针对性地对哪一个阶层的观众,比如知识分子会看哪个栏目,这样对双方都有益。节目编制人员也需要有针对性,现在双方都没有一个桥梁,广大观众都是单个的,双方都处在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里面。

王莉:节目编导也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受众群,我的节目就是做给这些人看的,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,有针对性地去策划、编制节目。

毕淑敏:包括去指导他们的反馈、沟通呀,现在这些都没有。

王莉:比如CCTV二套的《天天饮食》栏目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收视群,有一些观众收看的目的非常单纯,就是想学做菜。

毕淑敏:对,这个阶层的人就想看这个,那它的广告也会有针对性,比如给一个调料做广告,双方都受益。假如你让一个纯粹想研究医学的人看调料广告,看了也不会有太多的人买;比如有人特别想知道各种保健知识,有人愿意看发布的流行色,对我来讲,我根本不在乎流行什么,那个看了也白看,不会对我产生影响。

王莉:我理解您的意思,电视节目的受众应该是“细分”的。

毕淑敏:对。一定要细致,对观众进行结构性的分析,清楚地把握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,我认为双方都受益。现代人生活节奏这么快,他需要信息,但一定要有针对性,当然也有可以散乱地看的,那另说。我想大多数人,比如说我,我特别想知道非常遥远的地方那些我不知道的风土人情、历史掌故、自然风光,高科技的进展,还有遥远的星空世界,这些内容加上高科技的传输手段,再加上是精选制作的,做得非常好,肯定会比文字好多了。不过我认为电视虽然有很大的优势,但现在只是在那一窝蜂地“搅和”。

过去是360行,现在的行当据说是几千行、几万行。如果你给一个老头儿讲怎么哺育婴儿,根本就无效,你卖婴儿米粉、保健鱼肝油,他也不要啊。你给小孩子的妈妈讲老年中风、老年痴呆,文不对题,这不是白干了吗?观众没兴趣,你做得也很辛

苦,搭配的广告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,那么多电视从业人员,那么聪明,就要把事情做得精致一点。

王莉:现在出现一种进步的力量,湖南台办了一个女性频道,说明电视开始分类了。福建办了第一个新闻频道,思路非常好。这些是值得欣喜的。不过,现在电视台之间节目互相模仿、抄袭的例子很多,您如何看待电视节目的“克隆”现象?

毕淑敏:前不久我去美国,看了很多美国的节目,我一看就笑起来,那种电视的表现形式我们真的已“拿来”很多了。但是我在想,因为我们的电视发展肯定是在别人后面,并且在发展过程中,“抄袭”这个阶段一定是不可避免的。经过这个阶段后就会在其中有所选拔,而且会有所创造。我想有出息的就不止于承袭,还要向前发展。当然有人可能一开始就不抄袭,那就更了不得了。我个人不觉得抄袭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,形式这个东西是谁都可以拿来用的,形式是抄袭,内容还是适合中国的国情,看谁会学得更好,用了以后可能发展出新的形式出来,我倒不认为这个事情是很不堪的,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过程。

王莉:在美国您肯定看了很多节目,我知道奥普拉·温芙蕾(Oprah Winfrey)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,您能谈一谈对美国主持人的看法吗?

毕淑敏:我感觉美国主持人的形象与中国大不相同,比如采访江泽民的那个记者,是个老头,那么老,当然我不知道他具体多大年纪。这次CCTV“荣事达”杯主持人大赛,据说已放宽了报名年龄,可以到45岁,但在入选的选手里大部分还是年轻人。电视受众是各种各样的。在美国看电视,我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觉:他们的主持人第一不年轻,有很多不年轻的人;第二,有很多不好看的人。

王莉:您这个观点恰恰也是广院电视系老师上课时经常会谈及的问题。咱们的主持人多是一些俊男靓女,背着别人事先替他们写好的稿子,观众觉得他们这么年轻的头脑真的会教给我们什么东西吗?没有说服力,不易让人产生信赖感。而国外的主持人,大多是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资深记者来担任,尤其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,素质的要求更多的是能客观、公正、冷静地报道新闻事实,并做出前瞻式的分析和思考,脸蛋是否漂亮倒在其次。

毕淑敏:中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,尽管电视要求有专业知识,但因为电视受众都是普通人,那么主持人应有很好的亲和力,观众并不在乎他长得有多么美。另一方面,主持人一定要言之有物,“有物”还包括他语言的风格、样式,要亲切、幽默,同时要有思想力度,并且不能板着面孔,像一位深刻的思想家。我个人认为思想家更多是书斋里的,因为他表达的是很抽象的概念,这一点是挺重要的。

我看CCTV“荣事达”杯主持人大赛介绍出来的几个主持人,有点像很优秀的大专辩论赛的选手,可能在中国对什么人能当主持人,观念上还应该有一个改变。特别是谈话节目,比如两个年轻人在讨论一个老年人的问题,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这

样讨论,但是从这种角度来说,为什么说要有自己的声音呢?美国那个黑人主持人,每次她说哪本书好的话,销量会大增,在节目中她有一种权威性,形成一种品牌,大家认为她是认真地读了这本书,而且她有独特的见解。再者她不是受贿而说,她觉得这本书确实值得推荐。

电视有广大的覆盖面和传播力度,电视应提供那种更客观、更公正、更有特色的内容,而不是空洞、无效、泛泛的东西。这与主持人本身的品质有关,需要真诚的态度和敬业的精神,而不是因为商业的驱动来做这件事情。至于商业驱动,我认为电视不是不可以择商,广告就是它的商业,但商业也要有一些真正的东西。

王莉:您认为中国主持人最需具备的素质或最缺乏的东西是什么?

毕淑敏:我感觉中国主持人讲话普遍不简练,有时急了,都有一些套话:开始怎么样,中间怎么样,结束怎么样,每个场合都能用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幽默教给主持人,或中国有没有教幽默课的。我们文化传统中缺少幽默成分,要真正学习怎么样幽默,哪句话能引得大家会心一笑,这里面包含着机智。

王莉: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调侃,而不是幽默。

毕淑敏:常常是针对人身的一些调侃来得比较快,或者年轻人谈话时彼此开个玩笑,插科打诨的东西比较多,真正属于机智的幽默比较少。

崔永元做得比较好,但他属于经常把话尾拿来“翻出”一个说法来,这种风格已经形成了,也算一个特色,我觉得他还是做得不错的。

但是真正的语言中的幽默,或者冷幽默,或者很有力度的那种幽默,比如把一个严重的问题用精当的话讲出来。我老想有没有专门给人上上幽默课的学校,那不是小聪明能做得到的,也许小聪明可以做三次、五次,但是一个主持人要长年站在镜头前,一定要学习,要有讲究,这个话怎么说出来好,比如,“又要到什么什么的时间了”,“哎呀,时间过得真快,又要到我们说再见的时间了。”每次话都是一样的,应该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。这种说法传达出的信息真的没有价值。偶尔一次可以,但每次都这样观众肯定烦了。

要认真真地去研究、推敲。我现在学习心理学的课程,做心理谈话时,会把我所有的谈话录下来,课上大家看。指出来你这个眼神不好,这个体态不好,这一句话重复多余了,中间这几句的情绪不对,因为我不知道,有时我会觉得过程就这样出现了,就过去了,一次不要紧,多次这样,我以后注意了,能够做得更好。

节目中我不喜欢特别贫嘴的人,就像我们谈话中不喜欢特别贪嘴的人一样。我认为主持人讲话要有适量的信息,加上一种诚恳、真诚的态度,还有幽默的语言,但不是那种伶牙俐齿,单纯靠说话快、嘴皮子上的功夫,关键后面还得有内容。

王莉:光练嘴皮子,他干脆去报菜名得了(笑)。

毕淑敏:你要嘴皮子,天下还有耍得更快的人。我总认为人们拿出时间来看这

个节目,还是想看一些有深度、有厚度的内容,但要适量,还要有幽默感。

王莉:从《新闻联播》的播报新闻,到《凤凰早班车》的“说新闻”,甚至出现了“聊新闻”、“侃新闻”,您对这种现象如何看?

毕淑敏:过去我们的新闻追求一种庄严、庄重,现在新闻有各种各样的方式,不是一概而论的。新闻本身是不一样的,有庄重的新闻,也有一般的新闻,哪个地方有喜庆的事情,可以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讲,从头到尾不必用同一个腔调。比如某地生了三胞胎、五胞胎,这就可以说出来了,不用千篇一律,但不能认为“说新闻”就比“报新闻”好。有时候就可以报,拿一张纸怎么样,前一段报,后一段说,这个可以报,大的压力,因为你就是想传播信息,并不是为了想向我们展示你的记忆力有多么好,这样更开放。

观众在意的是新闻的信息量,新闻交流时能否达到一种它最大的信息量和可接受性。你要把一个很快乐的事说成特严肃的事,大家会觉得不协调,很快会走神。或者你把一个很严肃的事说得太滑稽了,也不容易让人接受。

关于主持人“出书热”

王莉:对主持人纷纷忙着出书,您持一种什么态度?

毕淑敏:对此我个人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。主持人是公众人物,当然这个公众人物不是出于他的文学上的成就才成为公众人物的,而在于传媒这种传播方式真的造就了一些公众人物,这里面有一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东西,有很多得益于现代的科技手段,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作,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写,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写,在原则上,人人可以写作。

但我们撇开他本人,不管是主持人还是相声演员,如果凭借文学作品,那与写自传式的回忆录标准就会不一样。如果是自传式回忆录,就要提供很多资料,提供一个真实的心理过程,不能说假话,不能蒙骗读者,你提供的内容不能与事实不符;如果你写的是一个文学作品,那文学作品对语言的结构得讲究,当我在这个体系里评论他们的作品时,我不会再认为他们是主持人,就对他放松或有更高的要求,我只有一个标准。

比如他是下岗工人,但我觉得他的文学很优美,他袒露内心,很有见解,我也会认为很好。比如他是一个主持人,名气非常大,但他只会讲我哪天到什么地方去了,没有具体的工作,可能那天你跑的地方真的很多,具体工作并不是个人的标志,除非有特别的事情发生,否则我们就没有什么必要知道他那些行踪。

王莉:您希望自己的某部作品还被改编成影视剧吗?有这种意向和打算吗?

毕淑敏:我觉得把作品改编不改编成影视剧是影视界的事情,他们是另一个专

业,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首先,写作的时候我不会想为了能被影视界看中而写作,我不会那样,我用语言文字写作,还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。如果他们看上了,认为有改的可能,就互相来讨论一下,看看他们对作品的把握是否很到位。

王莉:假如作品一旦决定被改编,您最看重的是什么?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吧?

毕淑敏:希望他们认真做。首先,我会听他们对这部作品初步的理解,大方向要一致,因为如果有很大的不同,他们不会盲目地来选择,跟我的小说没太大的关系了,这是对双方都好。其次,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,我还要看他们的态度是不是很认真。有的人虽然理解得不错,但可能在操作层面上还有障碍,因为电视剧的操作性很强,要有很多方面的配合,他有没有这份敬业精神也很重要,这样事情才可以合作。如果这两条都可行,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

王莉:那就放手让他们去拍吧(笑)。

毕淑敏:在这点上,我愿意用这个方法: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。你要是不喜欢,你可以不和他合作。在最初洽谈的时候,作为原作者,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,我可以去了解他们、信任他们。如果我认为信任感不足的话,我想也可以不合作。如果双方达成了一种共识,那我就相信他们去做。如果不相信他们,你就不要谈。

王莉:在选择演员等重要环节上您会干预吗?

毕淑敏:通常不会,但会有建议,他们有时会征求我的意见,因为毕竟是为了让这个剧好一些吧,我会谈我的意见,当然我会很清楚这只是一个建议而已。

关于求学

王莉:记得在广院听您讲座,您说过读书的过程很美丽,但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以致用。您是从中专、大专、本科、研究生、博士生一步步读过来的,以您目前的出色和文学成就,为什么要选择攻读博士呢?

毕淑敏: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好像是一句口号,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过程。鲁迅临终前几天还说,“倘能生存,我当仍要学习”。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,学习这件事情是他的生存需要,就像我们对别人说:“明天我们就死了,今天我们就不能喝水了。”学习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而且我现在这年龄去学习,它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更顺理成章,因为人年轻的时候有那种很迫切的生存选择的压力。或者我愿意学这个专业,可能报考的人太多,我不一定能考上,那么我就会调整一个专业,因为没办法;或者我现在特别想学习,可能我家里付不起学费,我又不能学;或者我现在很想上学,但我要结婚生孩子,正好这段时间又学不了,这有很多因素在干扰着我们的决定。

但以我现在这个年纪,这些因素都不存在了,我更多地让学习恢复到它本来的面貌,就是我求知的欲望,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那种探索的快乐。有人会说:“哎

呀！你很辛苦。”我学到了很多東西，我每天都期待着准時去上課，然後想“哦，今天我又學到了一些東西。”我去上討論課時，早年間可能我會想：“我這樣質疑老師，老師會不會不喜歡我；老師不喜歡我，會不給我好分數；不給我好分數的話，我的成績、科目、畢業就會有問題。”但是現在這些考慮都不存在了，因為我是為了求知，不是為了老師對我的一個評價來學習的，而是希望能夠更擴展視野，我會覺得學習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。

王莉：為什麼會選擇心理學作為專業方向呢？是否與寫作、人生有關？

畢淑敏：應該說選擇心理學是我對人有興趣。因為每個人的經歷會有不同，我最早是學醫的，後來又開始寫作。醫學是理科，寫作是文學科。科學有很多是以物為研究對象的，比如建築，我們不是說設計還要“以人為本”嗎？像研究物理、化學、太陽系、火箭等等都是以物、無生命的東西作為研究對象。真正以人體為研究對象的，我認為醫學是一門非常專門的科學。

王莉：從這個角度講，您的寫作和專業都是統一的。

畢淑敏：對。常常有人覺得我從醫學到文學是一個很大的跨越，然後我又去學心理學，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跨越？其實在這三者中有特別統一、貫穿的東西，那就是它們高度關注一個人，這個人，有生理的層面，心理的層面，有社會學的層面，並且這幾個因素密切相關。假如我生理上是殘疾人，我心理上一定可能有自卑，我可能會非常在意別人對我的評價，可能會有很多特殊的自己的感受在里面。那我在社會關係上，可能會被人歧視，我可能因此會特別奮發圖強，但也可能滋生一種嫉妒和仇恨，可能會非常善良，也可能會變得狠毒。對一個人來講，這種生理的、心理的、社會的層面是三位體的。

王莉：並且是貫通的。

畢淑敏：有一種打通的感覺。



我学心理学,老师对我的评价不错,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讲:“毕淑敏学得很好啊。”大家觉得可能很奇怪,“她为什么顺呢?她并没有心理学本科的基础”。老师说:“你看到她心理学是从头学起,但其实她是带着原来的经验而来。”比如这么多年来我对人的那种持久的观察。

关于写作

王莉:我们看您的书,大家觉得书中既蕴含了女性那种细腻丰富真挚的情感,又体现出洞察社会的敏锐触角和社会良知,我们非常羡慕您这一点。情文并茂的散文笔法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毕淑敏:谢谢你这样告诉我,我非常高兴,也很感动。我真的会很热爱人,因为也爱自己,也爱与我们同样的人,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宝贵,物种不断进化,到现在又有悠久的文化,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、敏锐的东西,这些都让我充满了兴趣,充满了好奇,包括有些人身上会有社会里的罪恶的、丑恶的东西,对这些人我会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?怎样变成了这样?它会有一个轨迹。对这些人我很持久的,非常关切地热爱,因为你很热爱一件事情,你就会有兴趣去做,而且愿意去探索。

王莉:您是用怎样的眼光和笔触来写作的?

毕淑敏:你是说写作一篇具体的文章?

王莉:是不是能够说以一种真诚来写作,我感觉有一种情绪在里面,又很美。

毕淑敏:我想真诚是对的。跟朋友在一起谈话,我说得不一定对,这是我的观点,我们不能保证自己是对的,对别人有什么指导,不是这样的,但这是我的看法,我的看法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,特别是写作,是因为你有感而发,不是无病呻吟。或者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,在自欺,而且在欺人。我有时可能说错,包括偏激、片面,或者由于自己心理上的一个结,但是我敢基本上认为我写的文章是我此时此地真实的想法。

中国有句古话叫“真、善、美”,当它提到真的因为“善”、“美”每个人可能看法不一样,但“真”会一样。

王莉:目前在创作什么作品?

毕淑敏:因为从1998年开始在读书,工作基本上没有,读书基本是全脱产,读得挺辛苦的。

王莉:心理学很难学吧?

毕淑敏:我的导师是美国的心理学博士,他特别不喜欢蒙混过关的学生,学术上的训练和治学很严谨。

王莉:我印象中上次您去广院讲座就是晚上下了课赶过去的。

毕淑敏：是的。我刚开始写论文还不合规范，因为我写的东西像散文，但我知道论文的格式。

王莉：可能这是写作惯性(笑)。写久了散文的人不知不觉、情不自禁就会有一种感受的表达。

毕淑敏：我想有两方面原因：一是像你说的习惯使然；二是可能也觉得：“哎，也没有关系，我把这个想法说清楚就行了。”我受到了一个很严厉的批评：“论文不是这样做的。”那时候导师给我批的(笑)，他非常认真啊，他说：“你这是材料的堆积，而且你用的材料是比较过时的。”(她兴高采烈地向我描述，一点没有沮丧)。到图书馆，我也抢不过那些年轻的“泡”在学校里的学友们。他们那么年轻，如果有一本好书，这个人还了，那个人就借走了，根本就轮不到我身上。我后来干脆就想：“哎呀，那我没有办法，我能找到什么资料就用什么。”(一直开心地笑着说)

从1998年到2001年7月才能读完，跨越4个年头去读书。我开始没想到会读这么长，先是读硕士，硕士只上一年的课，博士的课程是到明年7月，如果做博士论文，还会再延长。我常常说：“我非常努力，非常吃力，但是……”(大笑起来)

王莉：但是自得其乐，乐在其中，自己很喜欢读书这件事。

毕淑敏：对，我很快乐。如果不快乐的话，我想我就不要做这件事了。

关于职业

王莉：读完博士，您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什么打算？比如职业和写作。

毕淑敏：我现在对人的了解会多一点，而且角度不同了，会有一种学术上的支持。以前可能更多是一种感性上的认识，我个人的经历，或者经我个人的观察、判断得到的。现在有许多统计的学科的支持，我心里对事情把握的分寸感会更好一些。我想大前提肯定会做与人有关的事情，也会写这方面的东西。

王莉：还会做主治医生吗？

毕淑敏：那个医生我想我不能做了。人的精力有限，抢救危重病人需要大气力，体力要很充沛。比如，我夜里写小说写到3点多，大清早8点多抢救病人，给人出点娄子，责任重大，我想还会是做这几件事：人的生理的、心理的、社会的层面的事情。

关于家庭与婚姻

王莉：您有一个儿子，他喜欢读您的作品吗？准备从事文学创作吗？

毕淑敏：我儿子告诉我，所有关于他的问题都不要说。